



中译翻译文库·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中译翻译教材·翻译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

名家译论·妙趣天成·鸿儒论道·指点迷津

翻译美学导论

(第二版)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and Aesthetics

(2nd Edition)

刘宓庆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美学导论 / 刘宓庆著. —2 版.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2.1

(中译翻译文库·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中译翻译教材·翻译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

ISBN 978-7-5001-3259-2

I. ①翻… II. ①刘… III. ①翻译理论-美学-研究生-教材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699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7328 68359287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总 经 理 / 林国夫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袁仁辉

责任编辑 / 袁仁辉

特约编审 / 王明树

排 版 / 竹页图文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700×960毫米 1/16

印 张 / 22

版 次 / 2012年3月第二版

印 次 / 2012年3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259-2 定价: 4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谨以本书献给
我的严师

朱光潜教授
(1897—1986)

伯父刘永济(弘度)教授
(1887—1966)

父亲刘永湘教授
(1889—1972)

中译翻译文库·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 中译翻译教材·翻译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

编 委 会

顾 问

黄友义（中国外文局）

主任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柴明颀（上海外国语大学）

方梦之（《上海翻译》）

郭建中（浙江大学）

刘和平（北京语言大学）

吕和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穆 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恩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立弟（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 钧（南京大学）

张高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陈宏薇（华中师范大学）

辜正坤（北京大学）

黄忠廉（黑龙江大学）

刘士聪（南开大学）

罗选民（清华大学）

谭载喜（香港浸会大学）

王继辉（北京大学）

吴 青（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晓荣（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仲伟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委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Andrew C. Dawrant（AIIC 会员）

蔡新乐（南京大学）

陈 菁（厦门大学）

范守义（外交学院）

傅勇林（西南交通大学）

Daniel Gile（AIIC 会员）

陈 刚（浙江大学）

陈德鸿（香港岭南大学）

冯庆华（上海外国语大学）

郭著章（武汉大学）

何其莘 (中国人民大学)
黄振定 (湖南师范大学)
江 红 (AIIC 会员)
柯 平 (南京大学)
李亚舒 (《中国科技翻译》)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
刘宓庆 (同济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门顺德 (大连外国语学院)
潘志高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任 文 (四川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孙迎春 (山东大学)
王 宏 (苏州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 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闫素伟 (国际关系学院)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郑海凌 (北京师范大学)

胡开宝 (上海交通大学)
贾文波 (中南大学)
金圣华 (香港中文大学)
李均洋 (首都师范大学)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
林超伦 (英国外交部)
林克难 (天津外国语学院)
刘树森 (北京大学)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秦潞山 (AIIC 会员)
邵 炜 (AIIC 会员)
宋亚菲 (广西大学)
陶丽霞 (四川外语学院)
王 宁 (清华大学)
王振华 (河南大学)
文 旭 (西南大学)
杨 柳 (南京大学)
张德禄 (山东大学、同济大学)
张其帆 (AIIC 会员)
朱纯深 (香港城市大学)

特约编审 (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 伟 (四川外语学院)
王明树 (四川外语学院)
张 鹏 (四川外语学院)

李凌鸿 (重庆法语联盟)
杨全红 (四川外语学院)
祝朝伟 (四川外语学院)

项目策划

袁仁辉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译翻译文库·中译翻译教材

出版前言*

袁仁辉**

翻译是人类最重要、最古老的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之一。古往今来，在人际沟通、商务往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振兴、学术交流、文化传播、文明传承、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方面，翻译都起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翻译既需要实战技巧，又需要理论指导。翻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纯语言活动，而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沟通过程。

首先，翻译具有技术性。翻译对译者两种语言功力的考量，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的行文规范，译出原文的内涵和外延，甚至译出其“春秋笔法”。非此，不能“信”“达”“雅”。例如：

【原文 1】It takes him from the railroad car and puts him in the birch canoe.

-
- * 本文撰写后，承蒙北京大学英语系辜正坤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谭载喜教授、国际知名学者刘宓庆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鲍禄教授指点、肯定与鼓励，特此致谢。
 - ** 袁仁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欧盟法方向博士生，NAETI 英语一级笔译，具有中国律师资格和中国出版物高级发行员资格，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研究会会员，美国格理集团行业专家团成员，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员，主要编著有《现行法律漏洞的不当利用与防范全书（全三卷）》，主要著作有《七言韵律中国史》《七言韵律世界史》，主要英文论文有“A Historical View on the Export of American Law”（国际美国研究学会 2009 年第四届世界大会论文）、“Far from Crisis: a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Law Export Returns i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美国研究联络会 2010 年年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A Power-of-Discourse View on American Law Export”（美国研究联络会 2011 年年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ible and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the West”（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 2012 年第 18 届年会论文），发表“A View on Plant Variety under China’s Plant IP Protection System”“China’s Progress in Domain Name Litigation”等法律类/知识产权类英汉互译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中译翻译教材·中译翻译文库·中译历史文库·中译法律文库·中译美国文库·中译欧盟文库·中译英国文库·中译法国文库·中译德国文库”项目策划编辑。

It strips off the garments of civilization and arrays him in the hunting shirt and the moccasin. It puts him in the log cabin of the Cherokee and Iroquois and runs an Indian palisade around him. Before long he has gone to planting Indian corn and plowing with a sharp stick; he shouts the war cry and takes the scalp in orthodox Indian fashion. In short, at the frontier the environment is at first too strong for the man. He must accept the conditions which it furnishes, or perish . . .^①

【原译1】他从火车车厢里出来，钻进一只桦皮船里。他脱下了文明的外衣，穿上打猎的衬衫和鹿皮靴。他寄身在契洛克人和易洛魁人居住的四面围着栅栏的木头小房子里。不要很长的时间，他就习惯于种植玉蜀黍，用一根尖木棍犁地了；他叫喊厮杀，也剥人的头皮，跟道地的印第安人完全一样。一句话，边疆的环境首先对这个移民的人来说，影响是太大了。他必须接受环境提供的一切条件，否则他就会灭亡。^②

【改译1】殖民者跳下火车，钻进桦皮船，扔掉欧洲文明的外衣，上披打猎服装，下穿鹿皮靴子，来到契洛克人、易洛魁人木屋旁，仿照他们圈起一个木栅栏，在此居住下来。不久以后，他就学会了种植玉蜀黍，学会了用尖木棒耕地。他发出战争的嘶吼，剥下印第安人的头皮，跟当地的印第安人没有区别。一句话，在西进运动早期，边疆地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殖民者不是适者生存，就是小命不保。^③

改译中，“跳下”“钻进”“扔掉”三词突出了白人来新大陆拓殖的急迫心情；“学会”突出了白人初来新大陆时的无助状态，交待了白人在新大陆的生存得益于印第安人的慷慨相助，与其后来的“恩将仇报”形成鲜明对比；“扔掉”表明，白人认为，在新大陆与印第安人的交往中，只有丛林法则，无需考虑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观念，为后文的“发出战争的嘶吼，剥下印第安人的头皮”作了铺垫，而“脱下”只是一个普通动作，并不排除稍后重新穿上“文明的外衣”的可能性；改译1大量采用双音节动词，以增强节奏感，暗示出殖民者的不断西进与印第安人的不断退缩；其他处理，诸如将 at first 改译为“在西进运动早期”而非“首先”，是因为如果将其译为“首先”，则读者自会期待：“其次”“再次”乃至“最后”何在？

① 原文1、原文2均出自于美国历史学家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1893）上宣读的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一文。

② 黄巨兴译，张芝联校：《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于《历史译丛》1963年第5期。原译1、原译2均出于此译文。

③ 本前言所有改译，均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编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生袁仁辉翻译。本前言前两个译例，出自于笔者给北京语言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生所作的《翻译、写作与编辑》讲座。

其次，翻译具有科学性，需要科学翻译理论的指导，需要调动相关学科知识，要既能经得起证伪，又能经得起证成，既要经得起语义分析、逻辑分析和价值分析，还要经得起相关学科的专业考量。例如：

【原文 2】The existence of an area of free land, its continuous recession, and the advance of American settlement westward, explain American development.

【原译 2】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继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部的拓殖，都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改译 2】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认知补充）无主土地（法律术语），（但被东部国民）（认知补充，法律术语）不断蚕食，加上西进运动（得意忘形，历史术语）的雷霆万倾之势（认知补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史，就是向西拓殖史、向西发展史（得意忘形、认知补充、流畅通顺）。（括号内是根据法国释意理论和翻译质量控制要求做出的部分解释）

在这里，最难翻译的是 free land，一般都将其译为“自由土地”。^① 如果经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是否还有“不自由的土地”？难道土地与人一样，还可能“不自由，毋宁死”？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和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在任何英语词典中，free 的基本含义都是不受或未受控制、干扰、影响等类似含义。作者之所以用 free，是因为他“目中无人”——印第安人不是与他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人。其根据来源于：（1）罗马教皇的解释和诏令：早在 13 世纪，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就表示：非基督教徒的异教徒应当视为“非人类”，基督教徒组成的十字军可以合法占有他们的财产和土地^②；1455 年，教皇诏书 Romanus Pontifex 就赋予了基督教徒征服和统治非基督教徒土著人的使命和权利；^③（2）宗主国英国的传统：早在 1496 年，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就签发委任状，授权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发现那些未被基督教徒所知的国家，并取得所到之处的所有权；美国独立后，以国家继承的方式继承了这一权利；（3）国际惯例

① 黄巨兴（《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历史译丛》1963 年第 5 期）之后，将 free land 译为自由土地似乎成为业界通例，如丁则民（《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8 年第 3 期）、杨生茂（《美国历史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周小松（《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Robert J. Miller, The Doctrin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India Law, *Idaho Law Review*, 2005, p. 42.

③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被称为“发现论”的国际法律概念对土著人民的影响的初步研究》（2010 年 4 月）。

的认可:此后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也纷纷对其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地区主张主权;(4)美国联邦宪法的规定:根据1787年美国宪法,印第安人没有公民权,自然不可能对其占领下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不能对抗白人殖民者的侵占;(5)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182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Johanson v. M'Intosh* 一案中,确认了前述第2-4项理由的有效性与合法性;(6)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15世纪,欧洲法学家圣弗朗西斯塞·维多利亚(Franciscus de Victoria)提出了无主土地原则(Doctrine of Terra Nullius),文明国家可以基于先占或发现而取得对无主土地的主权,^①这是20世纪以前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印第安人不是“文明民族”,不是美国法律意义上的人,当然不对其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其土地处于无主状态,白人可以基于发现或先占原则取得其所有权。这样一来,从价值分析上看,西进运动、占领和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完全合理合法。因此,这里的 free land 实际上等同于 Terra Nullius,应当译为“无主土地”。

再次,翻译具有学术性。需要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范畴论、程序论、职业论、发展论等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从语言学、文学、美学等跨学科角度切入,也可以从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等跨学科门类的角度切入;不仅可以借鉴这些学科/学科门类的知识与理论,也可以借鉴其方法论,尤其是其思维方式,甚至包括其学术发展史。如此,翻译学大厦才能部件齐全、登高望远,才不会出现“理论对译者有用吗”^②等疑问,才能使翻译理论从翻译实务中来、又到翻译实务中去。例如:

【原文3】... as early as the first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a great many non-African experts could not rid themselves of certain preconceptions and argued that the lack of written sources and documents made it impossible to engage in any scientific study of such societies.^③

- ①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对某一特定领土取得主权的方式包括先占(occupatio,适用于对无主土地的取得)、时效(prescription,非法和不正当占有他国土地超过一定时间即对该领土取得主权)、添附(accretion,源于自然力作用如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或人工行为如围海造田)、割让(cession,以缔结条约的方式确认领土主权变更,包括强制性割让与非强制性转让)、征服(conquest,武力兼并他国领土,但不缔结条约)。现代国际法发展起来以后,已经完全否定了强制割让与征服两种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和时效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仅在特定情形下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自愿割让和添附这两种领土取得方式仍然保留下来,并出现了新的领土变更方式,包括民族自决、公民投票(referendum)、收复失地和交换领土四种方式。
- ② Emma Wagner and Andrew Chesterman.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Translation Theori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 ③ 原文3、原文4均出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英文版。目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正在对其译文进行修订。

【原译3】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仍然不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什么科学的研究。

【改译3】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欧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多仍未摆脱成见，认为没有书面记录和历史文献，就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在这里，non-African experts 不宜译为“不是非洲人的专家”，因为“不是非洲人的专家”或“非非洲人的专家”不仅容易被质疑有汉语语病，而且不能将非洲大陆以外、任何领域、任何时期的专家学者（也许包括你我在内？）排除，这当然并非原本文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于学术积累，包括其他学科或学科门类的学术积累。

事实上，只要学过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欧美，尤其是在欧洲，以世界历史发展中心自居久矣，近东、中东、远东等说法就是其例证之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认为，欧洲中心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历史分期以欧洲历史为基准，二是宣扬近代史就是欧美文明发展史及其在全球的普及史。^① 欧洲的历史理论具有真理性，视角又以西方为限。亚、非、拉国家虽然历史悠久，但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对于自身历史的研究也没有形成体系，在世界史上是依附于欧洲史的体系而存在。^② 因此，根据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传统，这里的 non-African experts 宜译为欧美史学界或欧洲史学界的专家学者。

最后，翻译是一门艺术。除了遵从技术的规定、接受科学的指引外，还需要进行适度的创造（校正）。例如：

【原文4】New food crops were introduced, mainly from the Indian Ocean.

【原译4】新的粮食作物传入了非洲，这主要来自印度洋……

【改译4】粮食作物方面，主要从亚洲国家引进了一些新品种。

从纯语言角度和翻译技能角度来讲，将 Indian Ocean 译为印度洋似乎绝对正确。然而，仔细思考，就会顿生疑问：印度洋是一片汪洋大海，怎么可能有粮食作物？因此，原文的真实含义是指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即亚洲国家，其实就是亚洲文明古国。可见，只要以翻译理论为指导，如法国释意学派的“得意忘形”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权力关系”论或“异化”论，或者翻译理论界众所周知的“创

① 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0页。

② 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载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造性叛逆”论,就完全可以进行适度校正,从而避免犯下“正确的错误”。

可见,翻译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一不小心,就可能一言障目,错误百出。然而,只要我们秉承对内容对等(不是相等)、形式相近、效果同一、证伪证成、适度校正的无限追求,还是有可能从技术而科学而学术而艺术的。

翻译风险虽高,但功莫大焉。从历史上看,翻译是一国语言、文学、经济、法律、哲学、科学技术发展与交流的重要手段。西方文明的兴起、发展与传播,中国三大宗教的引入与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开花结果,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翻译活动。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成为WTO的一员已经十年,中外联系日益密切,翻译的作用更加显著。中国正在崛起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WTO上诉机构中只认可英、法、西三种语言,MTI教育的上马和扩大……等等,都需要我们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翻译人才。

作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翻译出版机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应当更加有所作为,应当用好用活其独有的国家级翻译资源和翻译人才,应当成为中国翻译出版的重要阵地。

正因为如此,我们联合了国内外翻译理论与翻译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在对原有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和外语院校翻译系列教材等进行升级改造的基础上,推出了“中译翻译文库”和“中译翻译教材”两套大型翻译丛书。其中,中译翻译文库以中国原创翻译类学术著作为主,兼顾部分国外优秀翻译类学术著作的中译版,包括:翻译思想与理论研究丛书、翻译史研究丛书、口笔译教学与研究丛书、翻译名家研究丛书、经典作品翻译与传播研究丛书、行业翻译与翻译产业研究丛书、翻译名家自选集、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丛书、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等;中译翻译教材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联合翻译教学、翻译实务、翻译研究、翻译服务等各界资深人士,为中国各类翻译学习者精心打造的大型系列教材,包括:翻译专业本科生(BTI)系列教材、翻译专业研究生(含MTI等)系列教材、翻译选修课程系列教材、翻译证书考试系列教材、行业翻译系列教材(如法律翻译、医学翻译)等。

我们热忱欢迎国内外翻译理论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投稿。我们希望,“中译翻译文库”与“中译翻译教材”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在翻译技能训练、翻译理论构建、翻译思想锤炼、翻译艺术探究方面,体系严谨,论证充分,语言精美。我们相信,“中译翻译文库”和“中译翻译教材”一定会成为中国翻译研究与教学的标志性出版工程。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第二版）

出版前言

刘宓庆是中国当代知名的翻译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西方语言学及欧美语言教学理论；曾在大陆、香港、台湾多所大学任教，曾在联合国所属多个组织机构任汉英翻译；2006年至2011年，受聘于上海同济大学外语学院，任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刘宓庆先生长期从事翻译实务与理论研究，著有《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刘宓庆翻译散论》（以上图书曾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形式出版）以及《翻译美学理论》（与章艳合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等12部翻译理论专著，策划并主持编写了《翻译基础》与《高级翻译》一套研究生翻译理论教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分别于2009、2010年出版发行）。

刘宓庆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体现中国价值的翻译理论，坚决维护中国译界的理论话语权，创建了翻译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了现当代译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课题。其前期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功能理论观则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在国际学术界备受重视。

刘宓庆先生的基本理论主张是：一、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坚持文化战略考量；二、中国翻译研究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三、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基本理论的系统化整体研究；四、中国译论对策论的核心思想为“功能代偿”；五、中国翻译研究必须回归美学；六、汉英互译的译文操控理论；七、提倡翻译的优质教育。《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第二版）的修订主要集中于第二至第六点上。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的特点和贡献在于：一、加强了译学整体性整合研究，在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功能主义翻译观；二、从本位和外位的角度，深入探索了中国传统译学、当代译学和西方翻译理论的多维比较研究，为中国当代译学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三、从共性和特性两个维度对译学的美学观、文化翻译观和翻译的价值论等等深层理论问题做了很有意义的开拓性探讨；四、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全面地、坚决地维护了中国的理论话语权。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第一版）出版以来，国内不少高校根据教学需要，将全集作为图书馆、资料室装备书目，将全集之一部或全部指定为本校外语类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材或基本参考书，国外翻译教学界、翻译理论与实务界的不少人士也从中受益匪浅。同时，他们也对全集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在再版时加以增补与修订。为了总结近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为全国范围的翻译职业教育（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提供翻译理论上的指导，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主持并敦请刘先生推出《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第二版），拟陆续出版《新编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文体与翻译》（第二版）、《翻译美学导论》（第二版）、《英汉互译技能指引》、《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第二版）、《翻译与语言哲学》（第二版）、《文化翻译论纲》（第二版）、《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第二版）、《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第二版）、《口译理论》、《刘宓庆翻译散论》（第二版）及《翻译美学高级教程》等著作。

本位 本分 本色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序

罗进德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各卷陆续出版面世，作为这个项目的倡议者，应该对读者有所交代，也想借此机会同师友们交流一些感想。

刘宓庆其人其书，二十余年来已为我国翻译界所熟知，读者遍及大陆港台和海外，因此，为什么要出版这套全集，已经无须多加解释——这是许多朋友预料之中和期盼之中的事。这一项目的选题设想，也曾在资深专家论证会上受到充分的肯定。作为编辑出版中人，只想申说一点：出书应该着眼文化成果的积累，那么，就中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全局而言，刘先生作为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作为代表性成果，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普遍公认的。这套全集的出版，应该是我翻译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翻译一事，若以一种社会学的眼光细看，其实也有“三态”：职场上的一项专业技能；大学课堂里的一门功课；学者案头的一个研究对象。与此对应，翻译工作者其实包括了三种人：翻译从业者、翻译教师、翻译理论家。不过在多数情况下，翻译理论家是由翻译教师兼任的，所以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可以看作同一个群体。有些人一身而三任焉——既从事相当规模的翻译实践，又当翻译课的老师，还研究翻译理论，三管齐下，是为全才。刘宓庆就是这样的全才。翻译界一直有人讥讽搞翻译理论的人“理论头头是道，就是翻译不了一篇作品”。这样的空头理论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多不多，至少刘宓庆绝对不是。我所知道的许多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老师和朋友也不是。我以为，判断一位理论家的工作有没有价值，应该看他的理论工作对翻译实践（包括翻译实务、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服务管理、翻译学术出版等等）和人的心智成长有没有帮助，因为这才是理论工作的职责所在。实践、教学、理论三手都抓，三手都硬的全才，固然

值得钦佩,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三方面之中在某一两个方面有所侧重,成就相对突出的专家,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其实,对于理论和实践二者,要紧的并不在于哪个方面做得更多一点,贡献更大一点,而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密切联系良性互动呢,还是分道扬镳自说自话,甚至互相鄙视呢?我以为,片面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跟片面强调实践而轻视理论一样,二者属于非理性认识。不幸的是,这种非理性状态并不少见。理论家和实践家之间不仅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明显差异,甚至还存在着某种情感障碍。这使我感到痛苦,所以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多少消除那种非理性状态,缩小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行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这些年来,我一有机会就做一点,衔石填海,不觉老之已至。

首先是一套专业技能,是在知识密集基础上通过训练和实践形成的熟练技巧,不论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还是为了养家糊口,都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活跃的职业领域。职是之故,翻译必然是实践指向的,是注重应用的,是通过大量实际操作体现其价值并完善其品质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谈,认真做好白纸黑字的翻译,应该永远是学习翻译的人和从事翻译的人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我个人以为,对翻译作理论的研究时,这一点根本的立场也是不可以忘记的。刘宓庆一贯强调翻译的实践品格、翻译学的经验科学特性和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并强调翻译的“技能意识”,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把翻译定位为技能,绝非贬低翻译的价值,需知技通于艺,艺通于道。解牛的庖丁为何踌躇满志?因为他“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高贵的文惠君虽知夸奖庖丁的手艺,却没有达到庖丁的精神境界。勤奋地实践,加上精深地思考,会明白翻译非小道的道理,会得到庖丁那样的精神满足与升华。同时,技能意识也丝毫不会贬损翻译理论的学术价值,相反,我认为“技能意识”恰恰是翻译理论中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命题。谁也不必为抱有“技能意识”,为关注“怎样译”而自惭形秽。据我看,“怎样译”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因而不复存在也不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几年关于翻译质量下降的抱怨之声时有所闻,“怎样译”的问题现在是不是更值得翻译理论家关注,并切实努力帮助解决呢?

但是另一方面,在翻译实务,翻译从业者的圈子里面,对翻译理论的无知、误解和冷漠也的确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翻译有理论吗?”“翻译理论有用吗?”“我不懂什么翻译理论,不是照样儿干了一辈子翻译?!”恕我直言,这些话的确反映着某种认识上的误区,据我多年工作中的观察,有些翻译实践中发生的错误和缺陷,的确就是理论上的懵懂无知或错误认识引起的,只是人们没有、不能、或者不愿意用理论去分析罢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对理论的认识误区,其存在却有

历史的合理性。直到不久以前，翻译的技能并不是通过学校的课程系统传授的。大学里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甚至研究生课程，创立翻译研究中心，建设翻译系科，以及“翻译学”名分的出现，这些都是相当晚近的事。就在不久前，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大学本科翻译专业，这一决策说明主管部门也已经认识到了：会外文不等于会翻译。可是在那之前，会外文就等于会翻译，外文干部就等于翻译干部。翻译似乎只是一种心领神会无师自通，经过实践摸索出来的功夫，所谓“十年磨一剑”，“铁杵磨绣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我们翻译界的许多老前辈，甚至来不及读到毕业就因救亡、革命或建设的紧迫需要提前走上翻译岗位，有的甚至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在那样复杂危险的环境之中，连字典也没有几本。他们硬是凭着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毅力，在工作实践中刻苦钻研，逐步提高成长，并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经历和毅力，是极可宝贵，极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多少人幻想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不惜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今天，前辈们一步一个脚印刻苦钻研的精神尤其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但是，若要请教这些老前辈如何才能做好翻译，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回答却往往让人感到不得要领：“外文好加上中文好，自然翻得好。不要讲甚么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也不用讲，翻就是了。”如果请他们评论译作，好的就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不好的就是“胡翻乱译”，这样的翻译批评虽然不错，却没有说清道理，所以不具有知识的价值，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还有的实践家以“一辈子不看理论书”自夸，若请他们评说理论著作的得失，如何保证判断的准确？

人类的经验和知识是要经过富集、提炼和梳理，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社会的进步需要高效率、成批量地培养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这就要办教育，要开设专业课程，要为人师者去传道授业解惑，这些事情，没有理论的升华如何做得？就是老前辈带徒弟，要想徒弟能举一反三，恐怕光告诉他“翻就是了”也不行，要让徒弟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就得讲出些道理才行。否则的话，翻译岂不成了一片非理性、不可知的神秘天地？

在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翻译行业的实务、翻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翻译理论关注的热点都在发展变化。比如，翻译的应用研究、非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翻译服务行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等等，都在从职业生活现场渐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产生着创新性的成果。较之以古典文学为主轴的传统翻译理论，这些新作富有生气，更加贴近翻译的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现场感，加上机敏的理论思考，一扫沉闷乏味的老生常谈和不知所云的食洋不化，带来一股清新风气。中国的翻译实践是一座宏大丰富却没有充分开发的矿藏，只要翻译实践中的人们走出“翻译无理论”的认识误区，开动理论思维，找到适宜的研究方法，善用适

宜的理论工具,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创新性成果一定会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从实践中提炼,又到实践中丰富、检验和修正,并指导实践,求得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是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科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但是,几年来,反对翻译理论研究为提高翻译实践水平服务的声音,主张译学研究跟翻译实践分道扬镳各自精彩的声音不断传来,使我这个一直为“翻译理论有用”辩护的人不禁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困惑。社会上关于翻译质量滑坡的抱怨如果确有事实根据,那就有点儿“吊诡”——新时期以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教学一派繁荣昌盛,成果累累,可翻译质量却“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学本科翻译专业纷纷开设,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保证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这个问题,已经极现实、极迫切地提到我们的面前。

回顾二十余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走过的路程,确实是在不断的争议中前进的。翻译有没有理论?翻译理论有没有用?翻译学这门学科的名分能不能成立?中国的翻译学应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应不应该为翻译实践服务?如何对待外国的翻译理论?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一直处于分歧和争论之中,其核心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刘宓庆这些年虽然大部分时间讲学、研究于两岸三地,却并没有片刻放弃对这些关乎译学大是大非问题的现实关怀,他没有“失语”,没有动摇自己的学术立场,有时甚至因观点的不同而招致批判或攻击。这些故事,在《全集》中大多可以读得到,无须赘述。刘宓庆关于中国翻译学应否具有中国特色,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译论关系的问题,尤有个性鲜明的论述,且二十年来一直在不断丰富和成熟之中。他的治学历程颇有启示价值,读一读他为《全集》撰写的自序“四十年学术人生”和全集之十《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卷首的自序“翻译十答”便知。这些文字所反映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是他译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要想用治史的路数研求翻译理论中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些文字是值得一看的。但是我还想着重推荐两点:

第一点,在本体论层面,刘宓庆把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作为“文化战略”看待。如果我们承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文化的多元性确实面临威胁和挑战;如果我们承认在人文社科领域,包括译学领域,确实有西方学术霸权的幽灵在游荡,那就不能不承认:刘宓庆强调“文化战略观”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出自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我个人以为,刘宓庆的“文化战略翻译观”是他对中国翻译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一个有待展开和深入的课题,甚或有助于医治我们某些幼稚病。幼稚病之一,我看是对所谓“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对“解构论”的盲目追捧。对于“解构论的翻译理论”,郭建中教授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2000)一书中早有中肯的批评,指出它“对翻译实践来说,可能会产生负面的